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PRAYING FOR POWER

为权力祈祷

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

「加」卜正民 著

张华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周文彬总策划

PRAYING FOR POWER

为权力祈祷

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

「加」卜正民 著

张华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加]卜正民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海外中国研究)
ISBN 7-214-03992-3

I. 为... II. 卜... III. 佛教—关系—社会发展—中国—明代
IV. 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2571 号

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 by Timothy Brook, was first published by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of Harvard University, and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in 1993. Copyright © 1993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Translated and distribu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by JSPPH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5-226

书 名 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
著 者 [加]卜正民
译 者 张 华
责任编辑 府建明 戴宁宁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淮安市楚州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2.375 插页 2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992-3/B·106
定 价 27.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谨以此书
纪念我的老师**

**Holmes Welch
Joseph Fletcher**

中文版序言

中国佛教的社会史没有像它作为宗教史那样引起 20 世纪中国史学家的很大兴趣。陈垣在民国年间对晚明佛教作了精湛研究,但他是个极大的例外。这种学术倾向与西方和日本的学术对比格外鲜明。海外学者——尤其在 20 世纪后半叶——把中国佛教的研究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知识领域,不仅仅是为了佛教研究,还因为它有助于拓宽对数百年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沧桑巨变的理解。为什么两种学术传统对佛教研究如此异趣?这也许是引导中国读者进入关于明代士绅精英赞助佛教寺院之研究的一条有益途径。

我觉得,中国和西方学者对研究中国佛教的学术价值的态度差异,导源于中国人和西方人现代性经验的不同。在欧洲,现代性的核心标识之一,是破除与中世纪宗教有关的迷信思想。欧洲人花了很多时间通过广泛的思想运动来协调中和这种对迷信的排斥:16、17 世纪经历了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17、18 世纪又开展反宗教改革运动。西方人最终并未抛弃宗教,而是以新教的方式重新阐释基督教,消除了宗教不可置疑的绝对立场。因此之故,从 19 世纪开始,宗教被自由地变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

中国人的现代性经验没有走同样的路线。中国学者数世纪以来一直对宗教实践的理性表示怀疑,但是他们的怀疑和争论从来没有被放在一个能破除宗教在社会中的权威的更大的运动中。这样的排斥仅仅发生在新文化运动中,那时年轻的思想家们都挑战他们先辈的思想传

统,认为中国宗教是他们现代化目标的绊脚石。这种思想爆发的突然性意味着中国现代派破除迷信达到了比欧洲更突然、更迫切的程度,就像一句英国谚语所说的“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抛弃”,许多人相信这样做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可能同迷信的过去休战,那么也就不可能宽容现在的佛教和道教。如果这些宗教不可能被宽容,那么宗教本身就不值得认真的学者去关注。结果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中国人对待佛教,无论是实践还是研究,即使不是彻底的敌视,至少也是漠不关心。

欧洲学者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半个世纪间不仅对中国宗教有同样的敌视,并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外国人对宗教的立场不是漠不关心,因为其中多数人是基督教传教士。如果他们俯就中国人的宗教实践和宗教观念,那么这是基于一个很实际的理由。他们不得不否定中国宗教的价值以确立他们自己宗教的价值:他们决心用基督教的上帝来取代佛陀。在 20 世纪前半叶,这种态度随着西方的汉学能把自身与基督教传教事业区分开来就发生了转变。西方的学者对把中国人的差异转换成为西方人所认同不再感到兴趣。相反,他们宁愿保存和维持这种差异,宁愿把中国看成一个不是与西方趋同,而是一个经历了大不相同的历史过程并在未来能适切地期盼走自己道路的地方。中国宗教是吸引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之一,因为中国宗教的观念和实践似乎与欧洲的宗教观念和实践相当不同。与当今西方方兴未艾的几乎任何其他亚洲研究领域相比,研究宗教方面的差异的吸引力更为强烈。

西方对中国宗教的兴趣并非毫无政治意义。它建立在对(西方以外的)其他世界的宗教/迷信实践的调查(investigate)和分类(catalogue)权基础上。由此所做的调查和分类可能是为了证明其他世界的低劣——这一定程度上也是西方现代性的投射。杰出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表明了这种态度,他在 20 世纪第一个 10 年内写道:中国人生活在一个“神奇的国度”(garden of magic),当时的佛教只不过是阻碍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僧团组织的神秘实践”。这种调查和分类权不完全是西方文化的特征。它导源于 20 世纪塑造学术知识品性的亚洲和欧洲在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

大多数研究中国宗教的欧洲学者都拒绝凌驾于亚洲的西方帝国主

义主张。然而,他们的著作产生在后期殖民主义的语境中。很自然,中国学者没有兴趣参与这种东方学项目。佛教的遗存——它的塑像、经典、神秘实践——正是西方学者也许想研究和“收集”(collect)的东西。中国的知识分子置身于一个和他们的过去大不相同的关系中。这是一种克服和超越的关系,而不是恢复和保存在博物馆中的关系。只是到临近 20 世纪尾声,中国学者才有兴趣把包括宗教在内的中国过去的一切方面变成现代知识的一部分。

当我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研究中国文化时,佛教恰巧成为我走进学术殿堂的入门。我大学时代修的第一门中国课程就是中国佛教哲学。我由此出发是因为我当初的兴趣根本不在中国,而在佛教,这是那时多伦多大学能开出来的唯一的佛教课程。在这种兴趣后面鼓舞人心的是畅行不衰的日本佛教思想家铃木大拙(Daisetz Suzuki)的禅学著作。铃木以富有魅力的笔调阐述了一种迥异于我这个在新教家庭长大的孩子所学到的宗教世界观,激起了我好奇的兴趣并进而想学习更多。

1974 年,我作为交换学生到中国留学时,我对佛教的新兴趣听起来令人沮丧。那时宗教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研究上都是一块严加防范的禁区。然而,北京大学一位年长的图书管理员借给我《高僧传》,并介绍我阅读汤用彤的著作,以这些材料我开始了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学术生涯。与此同时,我写了一封书函求教杰出的 20 世纪中国佛教史学家韦尔慈(Holmes Welch)先生。然后,当我在哈佛大学读书时,韦尔慈便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和灵感源泉。这就是为何他的名字会出现在我把本书题献给三位恩师之中。

在北大留学和哈佛读研之间,我还在复旦大学学习了一年。在复旦李庆甲教授和善的指导下,我的兴趣从思想史转到思想和社会史。尽管在我最终决定论文选题之前还花费了好几年时间来阅读和思考,但当我回到哈佛着手研究生项目时,我已经倾向于从明代的社会和制度史来钻研佛教。本书所论述的地方士绅精英和佛教公共机构之间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就是这种研究的结果。

在 1993 年本书英文本初版时,同时代的学者们都不能肯定我是想

对明代的佛教史作研究,还是打算对明代的社会史作研究。我本人喜欢把此看作两者皆是。如果不考虑佛教研究和实践的现实世界背景,它就无法被理解。同样如此,佛教的论题如果被排除在研究之外,明代尤其是士绅的社会世界也就不可能被完全认识。几年内,研究晚中华帝国的西方学者开始拆除宗教研究和社会研究的樊篱,接受了我的研究方法。中国的读者也许乐意“萧规曹随”吧。

最后,我非常感谢刘东先生把拙作纳入他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也要深深地感谢他的学生张华博士和我的学生孙竟昊为本书的精彩翻译所付出的辛勤劳作。

卜正民

2005年4月18日

鸡鸣寺庭院中摆放着两块大理石碑,碑身的半部各被长长的蓝白相间的塑料防水布覆盖着。雕刻匠坐在阴凉处,在一块石碑的表面上镌刻出算盘珠一般齐刷刷的文字。这些文字是人的姓名。石碑的上端已经刻出两排数十个名字,还有许多名字等着他刻呢!我没有必要问他刻这些名单干什么,因为在每一个姓名下面都刻着钱款。1989年春我在南京逗留时,鸡鸣寺正在修复中,这些姓名就是捐助修复的功德主的名字。两块大理石碑一旦雕刻完毕,就要树立在鸡鸣寺院中,以表彰施主们的慷慨捐赠。捐赠者的姓名与石碑同在,流传千古。

雍和宫是北京的一座喇嘛寺,早在十年前就已经修复了。同年(1989)稍后我去参观时,发现刻有功德主姓名的石碑已经树立在大殿前的庭园之中。石碑上前面十排总共排列了150多个姓名。石碑的最上端镌刻着一条装饰华丽的龙,龙嘴里喷出四个字:“万古流芳”,以示捐赠者芳名因其善举将流传万世。对那些错过这种扬名机会的人来说,还有可能在1989年秋天作一次捐赠,重塑内殿里的佛像。庭院另一边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摆着捐赠功德簿,供来寺院参观的捐赠者签名,工程完毕后他们的姓名将被正式镌刻在石碑上。 2

在中国,树立石碑公布施主的善名,这种古老的习惯近年来得到了复兴。20世纪80年代政治气候的变化酿就了新的捐赠风气,推动了树碑立传的小小浪潮。这种新生代的石碑属于大大变化了的环境的产物,捐赠的社会意义在16世纪晚期和20世纪晚期不可同日而语;然而

石碑仍然充当着标准的宣传形式,纪念捐赠者的功德及其所赞助的项目。石碑并非简单的捐款记录。它所保存的不单是财富,还有社会地位和权力。一块石碑通过记录谁捐赠,就等于宣布了谁能捐赠,谁希望以捐赠来扬名,谁寻求以捐赠而使他在相关的社会群落中增加声望。因而,它证实了捐赠者和非捐赠者所属的社会结构。捐赠形式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依然保持不变,但是其隐含的内容随嵌含在碑文中的社会状况而变化,社会状况则随着时间迁移而转换。

本书涉猎经受了四个世纪历史风霜的石碑所描述的社会世界。它探讨晚明中国寺院捐赠的社会结构,着重考察地方士绅,他们是那个时代经济上捐赠寺院的主要力量。士绅是晚期帝制中国的精英。他们的正式地位来自在国家科举考试制度中的成绩和所取得的功名或头衔。在 16 世纪,士绅集团既指功名及第者,又包括他们由父系亲属、姻亲关系和社交网络而组成的更大的社会圈子,他们在主宰地方事务的范围和权力上大大扩张。为了表达这种权力,他们从事着各种类型的公共活动,向佛教寺院捐赠也许是他们宣示权力的最有意义的一种类型。

乍一看,佛教似乎代表一个远离尘嚣的世界,一个基于民众虔诚信仰的王国,士绅则往往对其敬而远之。毕竟,正统的儒者鄙弃佛教,认为它是人民大众的迷信;官方则怀疑佛教是危及国家安全、产生秘密结社活动的一个渊藪。而 20 世纪的学者们宣称,明代佛教已经衰象丛生,枯叶凋零。可令人惊讶的是,我发现 16 世纪中叶到 17 世纪晚期之间(晚明),寺院石碑上一直镌刻着大量地方士绅捐赠者的名字,这使我注意到想像中已奄奄一息的宗教道场,在士绅精英的努力下却恢复出盎然生机,而精英的培养却是要对佛教采取敌视态度的。这既令我困惑不解,同时也推动了本书的写作。

这项关于寺院捐赠的研究,起始于我在哈佛大学孔飞力(Philip A. Kuhn)教授指导下的博士论文。孔飞力教授在学术和分析方面的高标准要求,有时显得苛刻,但予人以激励。我一直努力不懈,争取获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初期研究的大部分工作是在日本进行的,我得到哈佛大学塞尔顿基金、日本科学促进会和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联合会的支持。在日本逗留的两年半时间,我被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聘为副研究员。佐伯由一(Saeki Yūichi)和岸本(婚前姓中山)美绪(Kishimot[née Nakayama]Mio)的友谊及思想情趣上的相惜,给予我在那里的时光留下了珍贵的记忆。另外,东京大学的田中正俊(Tanaka Masatoshi)和京都大学的竺沙雅章(Chikusa Masaaki)给我的研究工作的方向提出了根本性的忠告和建议,使我获益良多。我还要衷心感谢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全体职员及东洋文库、国家档案馆,以及尊经阁文库、静嘉堂文库和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的全体员工给予我的热心帮助。

在写初稿时,我得到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会、瓦特基金会和哈佛大学社会研究学位委员会的鼎力支持。我特别感谢该学位委员会主席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先生,是他使我置身于一个跨学科的学术语境中,这对我如何观察历史产生了经久的影响。修订工作极其缓慢,其间印刻了我从阿尔伯塔(Alberta)大学到多伦多(Toronto)大学的足迹,两所大学均慷慨地提供研究基金,使这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让·巴彻勒(Jean Baechler)、彼得·巴尔曼(Peter Bearman)、包筠雅(Cynthia Brokaw)、瓦勒利亚·汉森(Valerie Hansen)、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和亚历山大·伍德萨伊德(Alexander Woodside)都相继阅读了我的手稿,给本项研究的成型和方向提出了我所需要的极为中肯的批评性意见,并鼓励我设想我也许能使我的工作达到他们所希冀的水准。两项个案研究曾以不同的形式提交给两次学术会议,其一是1987年8月在伯内夫(Banff)召开的会议,我的题目是《中国地方士绅及其统治模式》;其二是1991年5月在明尼苏达大学召开的会议,题目是《欧亚近代早期(正规学校)教育、法律及社会秩序的重建》。非常感谢大会的组织者周锡瑞(Joseph Esherick)、玛丽·兰金(Mary Rankin)和爱德华·法默(Edward Farmer),及其他与会者,他们对我的论文均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意见。然而我最需要深挚感谢的人是我的同事和朋友——王国斌(Bin Wong),他给本项目的研究和写作的全过程给予的批评和指教,在一定意义上使本研究达到它应有的深度。

如果说我这书问世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霍姆斯·韦尔慈

4 为权力祈祷

(Holmes Welch)不能活着看到这项受他的工作和人格典范的鼓舞所产生的成果;还有约瑟夫·傅乐施(Joseph Fletcher)不能再一次成为我最严厉的和最具热情的读者了。这本书的问世,是对我这两位良师益友的最诚挚的纪念。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 1

序 言 / 1

导 论 寺院捐赠和士绅：问题 / 1

士绅研究史学 / 4

佛教与士绅 / 14

士绅社会和公共领域 / 21

佛教寺院的变动着的社会环境 / 26

第一篇 佛教的文化

第一章 张岱的激情生涯 / 41

第二章 函盖相合,冰炭不容：融通佛教 / 56

佛教与理学的关系 / 58

理学家的吸纳 / 64

理学家的回应 / 72

融通 / 80

第三章 一杯新茗听经时：士绅文化中的佛教 / 92

评估佛教在士绅社会中的出现 / 94

佛教的修持和礼仪 / 97

居士会社的组织 / 103

旅游观光与文化追求 / 107

士绅利用寺院空间 / 112

士绅变成僧侣 / 117

第二篇 寺院的捐赠

第四章 鼎湖山的捐赠者 / 137

第五章 士绅怎样捐赠寺院 / 157

钱财的捐赠 / 158

土地的捐让 / 162

士绅对寺院事务的监督 / 168

文学的赞辅 / 172

捐赠的历时性趋势 / 176

第六章 士绅为何捐赠寺院 / 184

从性别看捐赠 / 186

从宗亲关系看捐赠 / 189

宗教性的吸引力 / 194

社会性的吸引力 / 199

文化性的吸引力 / 204

社会的网络 / 209

宣扬士绅的身份 / 211

与商人的慈善捐赠的对比 / 213

第三篇 捐赠的地方个案研究

第七章 小县里士绅的捐赠：山东诸城县 / 227

诸城的环境和社会结构 / 228

诸城士绅 / 235

诸城的宗教机构 / 237

诸城的寺院捐赠 / 240

第八章 大县里士绅的捐赠：浙江鄞县(宁波) / 249

鄞县的环境和社会结构 / 249

鄞县的宗教机构 / 252

鄞县的大寺院 / 254

鄞县士绅 / 261

佛教和鄞县士绅 / 263

鄞县的寺院捐赠 / 267

第九章 捐赠与知县：湖北当阳县 / 279

佛教捐赠与国家 / 281

当阳的环境和社会结构 / 284

当阳的宗教机构 / 288

佛教和当阳士绅 / 290

玉泉寺的捐赠 / 293

士绅捐赠与知县 / 298

结 论 国家和社会的分离 / 312

晚明隐世的理想 / 313

佛教和晚明士绅 / 317

晚明与晚宋 / 321

晚明与晚清 / 324

参考文献 / 331

索 引 / 356

附图表

表 1 光明寺的地方士绅施主 / 241

表 2 鄞县精英士族的捐赠活动(1500—1644) / 269

表 3 17 世纪玉泉寺的士绅捐赠 / 294

地图 1 诸城县 / 230

地图 2 鄞县 / 250

地图 3 当阳县 / 285

图 1.1 20 世纪 30 年代的普陀岛前寺 / 49

图 1.2 20 世纪 30 年代的普陀岛后寺 / 49

图 2—7 朝圣之路：通向天童寺 / 132—134

4 为权力祈祷

图 8 阿育王寺舍利塔 / 197

图 9 20 世纪 30 年代的阿育王寺 / 198

图 10 玉泉寺 / 280

译后记 / 378